

福建侨乡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戴一峰 宋 平

导 论

侨乡是中国一个别具特色的社会现象。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侨乡指的是一种移民社会，它的形成有两个基本的前提条件：（1）该地区海外移民及其后裔的人数应达到一定数量，（2）这些海外移民及其后裔与该地区保持较密切的联系。依据这一界定，侨乡研究的主体内容应当是：侨乡与海外移民的关系及其在这一关系作用背景下侨乡的社会变迁。

众所周知，福建是中国的著名侨乡。据不完全统计，至1989年，福建籍海外华人达884万，占世界海外华人总数（2564万人）的34.5%，相当于福建总人口（2985万人）的29.6%。福建侨乡研究发端于本世纪初，至今已走过80多年的历程。总结这一研究领域的成果与不足，已是当务之急。笔者不揣简陋，略抒己见。不妥之处，还望方家指教。

一 福建侨乡研究的初兴（20世纪10—40年代）

福建侨乡研究发端于本世纪的10—20年代。这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

福建的海外移民，至迟可追溯到公元7世纪的唐代。其时随着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兴起，闽南海商便有涉足东南亚并留居当地者。历经宋元，入明之后，福建的海外移民人数渐多。至17世纪初，福建海外移民人数估计在10万人以上，并在东南亚形成早期的华侨社会。在此后的200余年间，福建侨乡在闽南零星出现。19世纪后半期，随着大批华工的出国，福建侨乡数量渐增。至20世纪初，福建侨乡社会成型，其特征已凸现。闽籍海外华侨与福建侨乡的关系日见密切。据不完全统计，在19世纪最后30年里，经由厦门进入闽南侨乡的侨汇，每年约有600—700万元。至20世纪头10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1800元。移居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地的闽籍华侨还开始投资经营厦门与东南亚间的轮船航运业，以及在厦门、泉州等地开设商行，经营茶叶、棉布等的进出口。^①此外，闽籍华侨还在闽南侨乡捐资兴办各种公益事业，诸如创办学校，建立医院，修桥铺路等等。因而，福建侨乡渐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福建侨乡研究的萌生，已在情理之中。

尽管福建侨乡研究发端于20世纪10—20年代，但这一时期见诸侨报侨刊的有关文章，大多是属于报导和介绍性的，鲜见真正带有学术研究意义的文章。值得一提的有黄炎培的《陈嘉庚废家兴学记》（载《东方杂志》，第16卷，第12号，1919.12），赵正平的《华侨对实业与教育之两大贡献（中南银行、厦门大学）》（载《中国与南洋》，第2卷，第2期，1921.5），黄科西的《福建侨务行政之沿革》（载《福州侨务公报》，第1期，1928.4）等。

30年代以降，福建侨乡研究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呈现一个小高潮。其中最值得称道的

成果要数陈达对粤东、闽南侨乡的调查研究。1934—1935年间，陈达应中国太平洋学会之邀，对粤东的汕头、樟林，闽南的泉州、漳州、厦门、集美、同安和海澄等侨乡作了内容广泛的调查。在调查基础上，陈达于1937年先后完成中文专著《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和英文专著《南中国的移民社会》。两种专著的结构与内容略有差异。^②陈达对福建侨乡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是他第一个较深入地探讨了福建海外移民与侨乡社会变迁间的有机联系。他运用社会学理论，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对比华侨社区、非华侨社区和南洋华侨社会的基础上，对侨乡的社会生活、家庭与婚姻、经济发展、教育与卫生、文化娱乐、民俗信仰等诸方面的变化，均作了较深入的探讨。陈达无疑是福建侨乡研究的开拓者。他的研究成果代表着福建侨乡研究初期的最高水平。

这一时期的另一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是对侨汇的研究。其代表作是吴承禧的《厦门的华侨汇款与金融机构》^③和郑林宽的《福建华侨汇款》^④。吴文详细论证了厦门侨汇与厦门对外贸易、对外通兑、金银流动等的密切联系；解剖了厦门的民信局、钱庄、本国银行、外国银行等四类金融机构的组织、经营特点以及与侨汇的互动关系。郑林宽的《福建华侨汇款》则从福建全省的视角，较深入细致地论述了闽籍华侨的分布及其与侨乡的关系，福建侨汇的数量以及汇款者的构成、侨汇的用途，侨汇对福建侨乡社会经济、生活习俗等的影响，侨汇机构与侨汇手续，福建吸纳华侨资本的能力等各个问题。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是作者对福建侨汇的估算。作者通过对厦门中外银行的调查，并充分吸收雷麦（C. F. Remer）^⑤、陈达和吴承禧等人的研究成果，对1905—1938年间福建侨汇的数量、来源、分布和用途作了较科学的估算。这一估算至今仍被学界视为是最具权威性的，被广为引用。此外，作者还对各种不同侨汇机构间的竞争与协调关系作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不少独到之见。该书附录的39个图表，内容广泛，不仅涉及福建历年侨汇的数量、来源，还涉及侨乡侨户的收支统计、华侨和侨眷的年龄分配统计等等。为福建侨乡研究提供了不少珍贵的资料。

然30年代后期福建侨乡研究的上述小高潮为时甚短。由于政局的动荡，40年代后，福建侨乡研究未见进一步的拓展。直到新中国的诞生，情况才有所改观。

二 福建侨乡研究的拓展（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中期）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福建侨乡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首先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外交关系的中断极大地影响了侨乡与海外华侨华人的联系；其次是海外华侨华人在居住国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对他们与侨乡联系的影响；第三是新中国政治对侨乡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侨乡的社会政治、经济发生很大变化。与此同时，福建侨乡的调查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福建侨乡研究的拓展，主要表现为各种课题侨乡调查的深入开展。我们顺次介绍如下：

（1）50年代初，为配合侨乡的社会主义改造，福建省侨务委员会曾组织对闽南侨乡的人口、土地、生产经营、侨汇、生活状况、教育等进行调查。有关这些调查结果的报告，陆续刊载于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编印的《侨讯》上。

（2）1956—1957年，厦门大学的庄为玑、林金枝和桂光华等人对晋江专区的泉州、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永春、德化、莆田、仙游和福清等11个市县侨乡先后作了6次调查。这些调查的最大特色是采用“分区调查”的方法以取代30年代陈达采用的“抽样调查”。因而调查的结果比较全面，也比较客观。收集的资料包括华侨史迹8处，华侨族

谱 80部, 华侨歌谣传说 4件, 口访资料 70件, 侨务文件 105件, 墓志铭 26件, 其它资料 2件, 总计 295件。对这次调查的初步研究成果以《福建晋江专区华侨史调查报告》为题, 发表于《厦门大学学报》上。^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调查收集来的华侨族谱的爬梳整理。如利用族谱整理出的晋江、永春和南安等县的华侨出国时间、地点、人数统计表; 从族谱挖掘出的明嘉靖年间晋江大仑乡蔡氏华侨与家乡的联系等等。由于这次调查是为了配合华侨史的编写工作, 调查主要注目于历史上的华侨问题。如该地区华侨“出国时间和地点问题”、“出国原因问题”、“出国的路径问题”、“出国后的生活问题”、“与祖国的关系问题”以及“出国的人口数字问题”等。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侨乡问题则仅附带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3) 1956年冬, 厦门大学的章振乾、陈克俭、甘重民、陈可琨等人组织了一个调查小组, 对晋江专区和厦门两地的若干重点侨乡进行调查。发表了以《福建主要侨区农村经济探论——侨区农村调查之一》^⑦为题的调查报告。章振乾等 4人均均为经济学者。他们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从侨区农村人口的构成、土地关系与经营使用的特点、华侨汇款的影响等几方面, 对闽南侨乡农村经济的特点作了较深刻的分析。并进而论述了这些特点对 50年代侨乡农业合作化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若干特殊问题。这是一篇很有特色的专论。遗憾的是此后我们未见到其后续之作。

(4) 1958—1962年,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受国家科学技术规划委员会之托, 调查整理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庄为玠和林金枝负责组织厦门大学部分师生在福建、广东 48个市县的侨乡以及上海等地进行调查。其中福建方面包括厦门、泉州、漳州、福州、晋江、南安、永春、安溪、同安、惠安、福清、莆田、仙游、龙溪、海澄、云霄、诏安、古田、永安、南平、漳浦、华安和东山等 23个市县侨乡。这是本时期内规模最大的一场调查。调查所得于 1960—1961年整理出《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初稿, 按地区编排分为福建、广东和上海 3卷。遗憾的是这批调查研究成果直到 80年代才得以真正问世并被广泛利用, 因而在当时没有产生本应有的研究效应。

(5) 1960—1963年,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组织契约华工专题调查组, 对晋江县的双阳农场、永春县的华侨农场、同安县的竹坝农场和云霄县的常山农场等侨乡华侨农场进行调查。调查集中于华工出国问题。

上述 50—60年代的一系列侨乡调查, 积累了数量可观的原始资料, 为福建侨乡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极好的基础。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 由于受 60年代中期政治运动的影响, 这一工作中断, 大量的侨乡调查材料被束之高阁, 并未得到充分利用。直到改革开放的 80年代, 这一时期侨乡调查潜藏的能量才不断被释放出来。

另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一时期, 福建各地侨乡陆续出版了一批侨刊乡讯。最早问世的是创刊于 1956年的厦门《鹭风报》和龙岩《岩讯》。两年后, 全省的侨刊乡讯多达 14家。其中 10家集中在闽南, 即晋江的《晋江》、泉州的《泉属》、南安的《南安》、永春的《桃源》、安溪的《安溪》、惠安的《惠安》、莆田的《莆田》、漳州的《漳属》、厦门的《鹭风》和《同声》。闽西有 2家, 即龙岩的《龙岩》和永定《永定》。闽东也有 2家, 即闽侯的《融城》和《闽侯》。1962年这 14家侨刊乡讯合并为《闽海》(福州)、《鹭风》(厦门)、《温陵》(晋江)、《萝江》(龙溪)、《闽西乡讯》(龙岩) 等 5家。这些侨刊乡讯记载了大量的侨乡信息, 为福建侨乡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然而, 1966年后,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它们相继被迫停刊或撤销

综上所述,建国后的 50—60 年代,可以称之为福建侨乡研究的积蓄期。大规模多层次的侨乡调查和各种侨刊乡讯的出版,为 80 年代福建侨乡研究的新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 福建侨乡研究的新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上半期)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给福建侨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也使自 60 年代中期以来沉寂达 10 余年之久的福建侨乡研究重新复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福建侨乡研究的发展概况可由以下 4 方面见之。

第一,侨乡调查的恢复。80 年代后,厦门大学历史系的师生曾利用教学实践的机会,多次到闽南侨乡作调查,编印了一批调查报告。这些调查就规模和质量而言虽远比不上 50—60 年代的调查,但它毕竟标志着福建侨乡调查的重新展开。1984 年和 1987 年,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华侨研究室和华侨大学华侨研究所曾先后与日本宫崎大学教育部社会经济研究室合作,以“华侨教育的比较研究”为题,对福建侨办学校的沿革和华侨学生回国升学等问题作了调查研究。发表了《关于福建华侨办学的部分调查》和《华大学生状况综合调查解析》等调查报告。^⑧此外,华侨大学的部分研究人员还多次赴侨乡调查,广泛收集各种华侨华人的族谱。这些族谱经过爬梳、遴选,已被编辑成书,近期内可望与读者见面。更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福建省侨联、泉州华侨博物馆、晋江侨办等单位相继组织人员对闽南侨乡作各种形式的较大规模的调查。可望使侨乡调查取得新的进展。

第二,出版了一批资料选辑。主要有 (1)《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庄为玠、林金枝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年), (2)《福建华侨档案史料》(福建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91 年), (3)《泉州侨批业史料》(中国银行泉州分行行史编委会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 年), (4)《闽南侨批史记述》(中国银行泉州分行行史编委会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 年), (5)《泉州海外交通史迹调查资料:泉州华侨史专辑》(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编,1980 年), (6)《泉州华侨史料》(第 1—2 辑)(泉州市侨联、侨办合编,1984—1986 年)。此外,各地侨乡的《文史资料》中,也不断有相关的资料刊载。

第三,出版了一批《华侨志》。80 年代以来由于各地普遍编修地方志,华侨志也应运而生。已正式出版的华侨志主要有《福建省华侨志》(1992 年)、《厦门华侨志》(1991 年)、《泉州市华侨志》(1996 年)、《晋江华侨志》(1994 年)、《同安华侨志》(1992 年)、《安溪华侨志》(1994 年)等。这些华侨志不仅吸收了现有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提供了不少新的素材。

第四,发表了一批学术成果。以福建侨乡为对象的学术专著至今尚未见到。但在 80 年代以来陆续出版的一批海外华侨、华人研究专著中,有较多涉及福建侨乡问题的,如《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林金枝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年)、《陈嘉庚兴学记》(王增炳、余纲编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年)等。至于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的学术性文章,据笔者所见,约有 252 篇。其内容涉及福建侨乡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人物等诸方面。下面我们将其分为 9 类,详加评述。

(1) 综合性研究。我们见到的唯一一篇综合性研究文章是浦永灏的《当代福建国际移民过程的效应及其评价》(载《中国社会科学》1988 年第 4 期)^⑨。作者借助人口学和社会学理论,从移民收入和经济地位的提高,家庭重心的转移,城市化过程的加速,经济的增长,移民语言文字的同化,文化意识的变更,侨乡教育事业的兴起等几方面,对 20 世纪 20

- 40年代福建侨乡国际移民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文化效应作了较全面深入的分析。并对这一效应产生的原因作了理论探讨。文中对移民家庭重心的转移、经济地位的提高以及文化观念的变更等方面所作的分析,颇有独到之处。但就华人文化被同化和消亡问题所作的论证,则似乎过于强调当地文化的先进性和华人传统文化的落后性,忽视了华人文化生命力。其结论与我们当今在东南亚所见的情况不符。

(2) 侨乡的海外移民史。海外移民是侨乡产生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外移民研究是侨乡研究的起点。这方面的文章不少,涉及的内容包括移民的原因、规模、结构、途径和特点等。其中不乏精彩之作。如对近代福建移民规模的估算,对移民动因的系统分析,对移民职业构成的解剖^⑩等等。但重复性的文章也不少。尤其是有关移民原因和特点的论述,有相当一部分文章只是重复一些众所周知的结论。此外,鲜见有文章关注50年代以后,尤其是近10余年来侨乡的新移民。仅有一篇文章探讨了80年代以来福建侨乡的非法移民^⑪可见新移民问题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3) 侨乡政治与海外华侨华人。新中国成立之前,海外华侨曾广泛参与中国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斗争,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方面的研究历来是个热点。但专论福建侨乡的文章不多。其内容除了涉及学界所熟知的华侨支持、参与辛亥革命、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大型政治斗争的问题外,尚有几个问题的探讨特别值得一提。一是闽籍华侨与闽南小刀会起义的关系。这是发生于19世纪中叶的一场以民间秘密会社为基础的抗清斗争;^⑫二是闽籍华侨与“闽变事件”的关系。这是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场由原十九路军将领发起的特殊的反蒋斗争;^⑬三是20世纪20-30年代由菲律宾闽侨发起的一场旨在进行政治革新、铲除恶势力、建设新福建的救乡运动。^⑭这是几个最具福建侨乡特色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无疑将加深我们对海外华侨与侨乡政治关系的认识。然而由于资料的匮乏,对前两个问题的研究,尤其是第二个问题,至今仍较粗略。此外,有关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华侨华人与福建侨乡的政治关系问题,至今未见专文论述。

(4) 侨乡经济与海外华侨华人。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上下对发展经济的全力追求,海外华侨华人与福建侨乡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引起学界的诸多兴趣和关注。其中绝大部分文章都集中于投资问题。若就涉及的时间段看,则以论述建国前和改革开放后的为多。关于建国前的投资,林金枝利用他在50-60年代组织、参与侨乡调查中收集的丰富资料,已发表一批翔实的论文。^⑮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投资问题,已有文章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从投资规模、部门构成、资金来源、地区分布、投资形式、经营年限等诸方面来探讨、归纳投资特点。二是论述东南亚华人大资本集团在福建侨乡的投资状况与发展前景。其中不乏一些精彩之作。^⑯但或许由于过度追踪热点效应,许多文章只停留于对现象的描述,缺乏具有理论深度的分析。此外,由于受资料所限,研究中还存在一些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尤其是有关这一时期投资的统计口径和统计数字问题。至于对50-70年代海外华侨华人在福建投资的研究,则几乎是一片空白。除了个别时间跨度较大的文章间有略加提及外,^⑰仅有一篇文章提供了有关1952-1969年福建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若干史料。^⑱

除投资问题外,近年来,部分学者还尝试从更多的角度来探讨海外华侨华人与福建侨乡经济发展的多重关系。如从海外移民所带动的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海外特殊市场的形成与对外贸易的发展,城市工商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的发展等诸多方面,论证海外华侨华人与福建港口城市发展间的密切联系;^⑲从福建侨乡旅客的构成,旅游的动机等方面来论证

海外华侨华人与福建旅游业发展的关系等等^⑳

(5) 侨汇。侨汇是海外华侨华人与侨乡联系的一条主要渠道。如前所述,这方面的研究在30年代末已达到较高水平。80年代以来这一领域研究的发展,主要表现于资料的挖掘上(参见前述)至于研究成果,大多属描述介绍性的,仅有少数较具质量^㉑除了在时间跨度上有所拓展,对侨批业机构的研究有所拓深,从而弥补了30年代研究的不足外,就整体水平而言,并未见新的突破。此外,对建国后的侨汇问题,至今未见专文作深入探讨。唯吴同永在《福建省侨汇的历史和现状》^㉒一文中,有“当代的侨汇”一节,简要叙述1949—1985年福建侨汇的情况。

(6) 侨乡公益事业与海外华侨华人。海外华侨华人通过捐资、捐物及其它形式参与和推动侨乡的公益事业,由来已久。相关的研究,数量不少且大多集中于侨办教育问题上。这些文章大体上可分为3类:(a)某一华侨华人对侨乡教育的贡献;(b)关于一个县或乡的侨办教育;(c)对福建全省华侨教育的综合研究。一般说来,前两类文章大多属描述性的事迹介绍,资料性较强;后一类文章则学术质量较高。如对建国前后福建侨办教育演化特点的比较分析,对福建侨乡教育结构变迁的宏观分析等等^㉓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有学者注意到侨乡侨办教育的一些新动向,即投资办学这一新形式的出现,对此作了有益的探讨。^㉔

除教育之外,对海外华侨华人在侨乡捐办的其它公益事业,如兴办卫生、科技事业、兴建文化娱乐设施,修筑道路、桥梁、雨亭等等,则鲜见专文加以探讨。尽管大量的报导和介绍充满了地方的侨刊乡讯和文史资料。

(7) 侨乡民俗与海外华侨华人。如前所述,陈达在30年代的侨乡研究中便已注意到闽南侨乡民俗的变化。但此后,福建侨乡民俗的研究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年来,这一情况有所改观。1993年12月,福建省民俗学会等组织还在晋江侨乡举办了“福建侨乡民俗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福建侨乡民俗》一书,结集会议论文28篇^㉕此外,在报刊杂志上也有若干论文刊出。这些论文主要论述闽南侨乡的民俗及其流变。其内容涉及晋江侨乡民俗的形成与特点,泉州侨乡的社会心态与民俗,晋江侨乡的鬼神信仰,霞浦侨属的穿俗演变等等。其中不乏一些精彩的分析。但重复劳动的情况也较突出。不少论文的论述大体雷同。而对于闽南侨乡的“送顺风”、“脱草鞋”、“拜公妈”、“三回头”、“引水魂”等特色民俗形成的时间和过程,则缺乏认真、科学的考证。对侨乡民俗文化的社会意义和效应也缺乏深入的理论挖掘。

(8) 侨务。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使福建侨务工作更多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福建侨务问题的研究也随之渐有发展。研究的内容包括侨务政策的制定、实施及其演化,侨务机构的历史沿革,侨务工作人员的队伍建设等等。出现了一些质量较好的文章。如陈楚材的《引导海外宗亲活动效应问题研究》,对如何看待和处理海外华侨华人在侨乡的宗亲活动,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分析^㉖但总体而言,福建侨务问题研究仍是一个较薄弱的领域。首先,许多文章仅停留于就事论事,缺乏理论上的探求。其次,有关侨务政策的文章大多仅是论述政策实施中的问题,鲜见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对政策本身作出评估。第三,对侨务机构的研究不仅数量极少,而且现有的研究也仅停留于对机构历史沿革的一般描述上,缺乏对侨务机构本身结构、功能、及其运作状况作深入的分析。

(9) 人物传记。80年代以来,有关海外华侨华人的传记性文章大量出现于各种报刊杂

志。但本文只讨论那些与福建侨乡有关的。这类文章仍不少。其中关于陈嘉庚的最多，其次是胡文虎。陈和胡是两位对福建侨乡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华侨代表人物。福建省为此设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出版专门的研究刊物，问世了一些较具质量的文章。^②除陈、胡外，人物传记还涉及其他诸多的闽籍海外华侨华人。其中受关注较多的是如下的两类人：一是对侨乡发展作出过贡献的闽籍海外华侨华人；一是与侨乡发生一定联系的当代闽籍海外华人大企业家。

人物研究可以使侨乡与海外华侨华人关系的研究具体化和生动化，加深人们对这一关系的认识，从而深化侨乡研究。但如何开拓和深入人物研究，却是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已有的研究，总的说来，较注重人物对侨乡贡献的事迹介绍，鲜见对人物行为的深入分析。而且，重复介绍的现象也较严重，尤其是关于陈嘉庚、胡文虎、李清泉等人的文章。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观点看，人物研究除了关注知名人物外，还需要有对普通人物的研究，才能完整地把握侨乡社会。此外，还可以考虑从单个人物研究发展到人物群体研究。

四 对若干问题的探讨及其展望

上述可见，从20世纪10—20年代发端至今，福建侨乡研究已走过了80余年的曲折发展道路。80年代以降，这一研究在复苏之际，也提出了一些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这里我们拟从选题、理论、方法和队伍等几方面，对福建侨乡研究，尤其是80年代以来的研究，作一个总的评价，并对今后的发展思路提出一些初步意见。

第一，选题问题。我们查阅的80年代以来研究福建侨乡问题的文章有252篇，我们将这些文章按内容和涉及的时间分类，制成下表：

类别	综述	移民	政治	经济	侨汇	公益	民俗	侨务	人物	合计
建国前	3	29	17	15	13	23	27	5	69	202
建国后		1		19	1	7	2	15		44
跨越前后	1	1		1	1				2	6
合计	4	31	17	35	15	30	29	20	71	252

从上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福建侨乡研究的选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偏好。首先是对历史题材的偏好。在总数252篇文章中，涉及建国前历史题材的就有202篇，占80%以上。这种对历史题材的偏好，与研究队伍的构成有很大的关系（详见后述），但这同时也表明，对当代福建侨乡的社会调查研究亟待展开。

其次是文章所涉及内容分布的不均衡。有关建国前的文章中，人物传记式的文章多达69篇，占34%。其次是移民和民俗，分别占14%和13%。再往下依次为公益、政治、经济和侨汇等。而以侨务和综述为最少。有关建国后的文章，则更明显地呈现出分布的不均。除经济（占43%）、侨务（占34%）、公益（占16%）外，其余领域则寥寥无几，甚至空白。这就造成一方面是选题的重复，甚至是内容、材料的重复；另一方面却又是不少领域至今仍处于空白或半空白状态，鲜见专文探讨。

上述可见，福建侨乡研究领域的拓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应当引起充分的重视。尚需指出的是，历史题材在选题中占居过大比重，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这方面的研究。恰恰相反，就选题而言，历史题材的研究也还有许多空白和半空白。以侨务为例，对晚清和

民国时期侨务机构的结构与功能及其历史演化, 福建侨乡地方当局的侨务政策、实施情况及其影响等等, 至今均未见专文认真加以探讨。此外, 以侨乡社会为背景的华侨家族史的研究, 典型侨资企业的个案研究, 侨乡归国华侨社团的研究等等, 也是至今鲜见专文涉及、亟待深入开展的领域。至于当代题材的研究, 亟待拓展的领域更多。举凡当代侨乡的新移民问题, 侨乡特殊社会组织如老人会、校董会等的问题, 侨乡与海外华侨华人开展的多种经济合作问题, 侨汇送款形式和用途的变化问题, 华侨华人捐办教育和其它公益事业形式的变化问题, 侨乡社会习俗与社会观念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问题, 侨乡与海外华侨华人社团的关系问题, 侨乡与在居住国出生的华侨华人后裔的问题等等, 均有待于作深入的研究。

第二, 理论问题。社会科学研究的目標不在于描述一种社会现象, 而在于分析和解释这种社会现象, 从而使人们对这一社会现象的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理论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但就福建侨乡研究而言, 理论的探讨却是相当薄弱的。至今未见专文对福建侨乡问题作深入的理论探讨。涉及各类题材的文章中, 有相当一部分仅满足于平铺直叙地描述某一社会现象或某一人物, 再加上几句“爱国爱乡”的套语。

爱国爱乡确实是广大海外华侨的一种本色行为。作为一种解释框架, 用它来阐述海外华侨在侨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 原本无可非议。但是, 滥用这一解释框架, 把这视如一种可以信手拣来, 随处张贴的标签, 则不仅窒息了对侨乡研究的深入的理论探求, 而且制约了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和材料的取舍。这是多年来研究课题大量重复又无所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

进而言之, 热爱乡梓原本指的是海外华侨浓厚的乡土观念。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形态, 它既包含着历史的因素, 也包含着现实的因素。在它下面, 原本应有更复杂、更丰富的内容。但遗憾的是, 这常常被忽略了。

更值得指出的是, 如果说“爱国爱乡”这一解释框架在有关历史题材的侨乡研究中被滥用已可能导致上述不良后果, 那么, 将它硬套在当代侨乡社会的研究上, 则更是贻误无穷。众所周知, 二次大战以降, 以东南亚为主的海外华侨社会已发生了极大变化。即从侨居的移民社会逐渐转化为定居的少数民族社会。大多数华侨已加入所在国国籍, 改变了其政治身份。海外华人的家庭重心已从侨乡转移到居住国。当地生的第二、第三代华人不仅在生活习俗、语言、宗教信仰等方面有了很大变化, 而且在家乡观念上也有了很大变化。面对上述种种变化, 仅仅采用“爱国爱乡”这一分析框架显然不足于全面把握海外华侨华人与侨乡的关系。就拿投资来说, 80年代海外华侨华人在福建侨乡投资的再度兴盛, 是在一个与20-40年代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忽视这一时代变化, 一味归之于华侨华人的爱国爱乡, 显然不足于准确、完整地解明这一现象。但忽视海外华侨华人投资与一般外资的区别, 抹杀其个性的存在, 则是走向另一种偏颇之见。我们认为, 80年代以来海外华侨华人在福建侨乡的投资, 既有历史连续性的一面, 也有时代新特点的一面。两者处于一个互相交错, 彼消此长, 不断变动的过程。对这一问题的科学认识, 只有通过深入调查研究, 并通过对上述两个不同历史阶段华侨华人投资的比较分析, 才能达到。

总之, 侨乡研究的理论探求, 是一个亟待展开的艰辛工作。我们需要借助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心理学、行为学等各种学科的相关理论, 以求得在侨乡研究上理论探求的深入拓展。

第三, 方法问题。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我们借助于分析, 认识研究对象的中介手段。不

同研究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我们从各种不同角度深化对研究对象的认识。福建侨乡研究,就研究方法而言,显得过于单一。我们查阅的上述 252篇文章,绝大多数是运用传统的叙事史学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较注重事件的来龙去脉、因果关系和本质特点。这是它的长处。但是,它也易使研究者陷入一种直线型的因果链条思维模式,陷入一种“原因—过程—结果”的僵硬的叙事框框,从而使一个原本生动多彩的研究对象人为地简单化和表面化。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我们应大力提倡在侨乡研究中引入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期开拓研究的视野,提高研究的水平。

此外,就侨乡研究而言,比较研究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比较可以有纵、横两种。所谓纵的比较,我们指的是对侨乡不同发展阶段的对比和分析。尤其是对 20—40年代和 80—90年代这两个历史时期侨乡社会的对比和分析,更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是侨乡与海外华侨华人关系密切,侨乡社会剧烈变动的两个时期。从表面上看,两个时期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认真深入的考察却可以发现其似是而非。两个时期的差异显示出历史发展的连续与非连续。对此所作的比较研究,一定会有不少可喜的收获。

至于横的比较,我们指的是侨乡与非侨乡以及不同类型侨乡间的比较研究。这一研究方法在 30年代陈达的调查研究中已被采用。此后却长期被学界所忽略。毫无疑问,这种比较研究将大大加深对侨乡社会特点的认识。

第四,队伍问题。福建侨乡研究的队伍,大致由两类人员组成。一类是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专业研究人员;另一类是各级侨务部门的工作人员。至今为止,前者主要出身于历史学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研究课题与研究方法选择的某些局限性。至于后者,由于具有实际工作经验和接触地方资料的便利,他们有着很大的研究潜力。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前期训练,他们的选题和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受专业研究人员的影响。他们大多倾向于撰写叙事式的介绍性文章。

上述可见,福建侨乡研究队伍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短期内改变这种队伍结构似乎不太可能。但吸引更多的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其它学科出身的研究人员加入研究侨乡研究队伍,则是应当重视的一个努力方向。另一方面,要鼓励现有的研究人员学习和掌握各种研究方法,鼓励他们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于各级侨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则可以采取培训的办法来提高他们的研究水平。

此外,研究者应当不断拓展和丰富自己的知识面,尽管他研究的对象只是侨乡。首先,研究者应当对整个华侨华人研究领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其次,他应当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显而易见,一个研究者如果不了解、熟悉海外华侨华人在定居国的历史和现状,不了解他们在居住国政治地位、经济状况和观念形态的变化,则无以正确把握海外华侨华人与侨乡的关系;而如果不了解和熟悉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和特点,又无以正确把握侨乡社会本身的发展进程与特点。因而,拓宽知识面应是侨乡研究者的明智选择。

(作者分别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副教授;责任编辑程希)

注释:

① 参见戴一峰《闽南华侨与近代厦门城市经济的发展》,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

② 陈达:《浪迹十年》,第1—13页,第156—16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1936年。

- ③ 载《社会科学杂志》第 8 卷,第 2 期,1938 年。吴承禧的其它有关侨汇的论文尚有《厦门的华侨汇款》(载《华侨半月刊》,第 98 期,1937 年);《最近五年华侨汇款的一个估计》,(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 3 卷,第 3 期,1937 年)等。
- ④ 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1940 年。
- ⑤ 见 C. F. Remesf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Shanghai, 1928。
- ⑥⑦ 分别见《厦门大学学报》,1958 年第 2 期和 1957 年第 4 期
- ⑧ 《关于福建华侨办学沿革史的部分调查》;廖赤阳、李红:《华大学生状况综合调查解析》,载《华侨大学学报》,1988 年第 1 期。
- ⑨ 作者的另一篇内容大致相同的文章,《论福建侨乡人口国际迁移的社会、经济、文化、意识效应》,载《人口研究》,1988 年第 5 期。
- ⑩ 见戴一峰:《论近代福建华侨出入境规模及其发展变化》,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 年第 2 期;浦永灏:《福建侨乡人口国际迁移动因的系统分析》,载《人口研究》,1988 年第 2 期;吴凤斌:《民国时期闽西海外移民问题的调查研究》载《南洋问题研究》,1994 年第 1 期;孙谦:《清代闽粤海外移民的结构与成因》,载《南洋问题研究》,1995 年第 3 期。
- ⑪ 见叶文振:《福建沿海非法移民潮的原因分析》,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5 年第 2 期。
- ⑫ 如唐天尧:《华侨与闽南小刀会》,载《华侨历史论丛》(二) 1985 年;陈诗启:《小刀会与闽南归侨》,载《闽南乡土》1985 年第 1 期
- ⑬ 如张晓东:《海外华侨与福建人民政府运动》,载《福建论坛》,1991 年第 2 期。
- ⑭ 见施雪琴:《20 世纪 20-30 年代菲律宾闽侨救乡运动的历史背景》,载《南洋问题研究》,1995 年第 2 期;《南洋闽侨救乡运动与漳龙路矿计划》,载《南洋问题研究》,1995 年第 4 期;《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菲律宾闽侨救乡运动》,载《华侨华人与侨务》,1995 年第 2 期。
- ⑮ 如林金枝:《近代福建华侨投资企业的历史及其特点》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 年第 3 期;《近代华侨在福建的投资及其作用》,载《福建论坛》,1982 年第 1 期;《近代福建华侨投资企业的特点》,载《华侨史话选编》1984 年第 1 期;《利用华资,振兴福建:近现代华侨投资福建历史特点的启示》,载《南洋问题》,1984 年第 1 期。
- ⑯ 如黄英湖:《福建省近年来华侨回国投资特点析论》载《华侨历史论丛》(四) 1987 年;《福建省近几年华侨投资问题的探讨》载《华侨史研究论文集》(二) 1988 年。叶小敦:《论福建与菲律宾华侨大资本的经济合作》,载《华侨华人与侨务》1994 年第 1 期和第 2 期。
- ⑰ 林金枝:《利用华资,振兴福建:近现代华侨投资福建历史特点的启示》,载《南洋问题》,1984 年第 1 期。
- ⑱ 见徐永基:《华侨投资福建地方工业:记福建省华侨投资公司 17 年(1952-1969)》,载《华侨历史论丛》(六)。
- ⑲ 见戴一峰:《闽南华侨与近代厦门城市经济的发展》,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4 年第 2 期。
- ⑳ 见林德荣:《华侨华人与侨乡福建旅游业的发展》,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2 年第 3 期。
- ㉑ 如林真:《福建批信局述论》,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 年第 4 期;吴永同:《侨汇发展变化浅析》,载《东南亚华人经济》,1989 年;黄清海:《泉州侨批业史初探》,载《八桂侨史》,1995 年第 1 期。
- ㉒ 载《华侨历史论丛》(四),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编印。
- ㉓ 蔡仁龙:《解放前福建侨办教育沿革》,载《南洋问题》,1986 年第 3 期;冯洋:《福建侨办教育发展初探》载《华侨历史论丛》(三);蔡仁龙:《福建侨办教育发展初探》载《福建学刊》,1987 年第 2 期;廖赤阳:《福建侨办教育历史的回顾与前瞻》,载《华侨史研究论文集》(二),1988 年;《建国后福建侨办的发展与前瞻》,载《华侨大学学报》,1987 年第 2 期;《建国前福建侨办教育简论》,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 年第 2 期。
- ㉔ 宋平:《模式分析:论闽南的侨办教育》,载《南中国:20 世纪国家、文化和社会的演变》,第 197-204 页,荷兰皇家社会科学院,1996 年。
- ㉕ 陈国强主编:《福建侨乡民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 年。
- ㉖ 陈楚材:《引导海外宗亲活动效应问题研究》,载《华侨华人与侨务》,1996 年第 3 期。
- ㉗ 如廖赤阳:《试论陈嘉庚与福建经济建设》,载《华侨大学学报》,1987 年第 1 期;林金枝:《论陈嘉庚先生倾资办学及其影响》,载《南洋问题》,1984 年第 4 期。